

· 城市与区域经济 ·

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的“中国路径”^{*}

李程骅

内容提要:通过发展服务业、构建服务经济体系来实现城市转型,是国际城市发展的共同规律。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的发展尚未形成互动关系,现代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发展的动力机制没有形成,影响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城市功能的优化。面向“十二五”及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国内城市应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之下,立足于城市空间价值的提升,以制度的创新、多重倒逼机制的实施,来加快服务经济体系的建立,综合提升自身的能级水平和核心竞争力,积极探索出一条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的“中国路径”。

关键词:服务业 城市转型 中国路径

一、我国城市转型与服务业发展的对应关系认知及验证

城市化、城市扩张的动力来源于产业的推动,城市转型的本质是产业升级带动下的城市功能的提升、城市空间的优化。纵观世界现代城市发展的进程,如果将20世纪50年代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城市转型的起步期,那么到当前为止的半个多世纪中,全球化视角下的城市经济转型发展,实际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下的向服务经济体系的转变,重点表现为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型”转型,从制造型城市向服务型城市转型;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主动型”转型。全球信息技术革命,大大降低了城市、区域间的交通、物流成本,促进了新型的现代服务业大发展,这不仅提升城市自身的能级,而且还逐步构成了全球城市体系,并形成全球产业价值链。

国际上的城市转型行动,无论是在“倒逼型”的还是在“主动型”阶段,服务业所发挥的多元动力都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带来的“乘数效应”更为明显。现代城市转型发展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产业不断升级、构建服务经济体系的过程,从制造业向服务业、从生产中心向商务中心是基本的

规律。尤其在经历了工业化的阶段之后,城市必须靠服务业的发展才能回复其本质特征,再造以人为本的空间环境,以激发人的创造性,满足人的交往需求和发展需要。服务业尤其是其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城市转型升级、功能提升的过程发挥的综合效用最大。这是因为在城市化进程中,服务业的范围不断扩大、业态不断多样化,而城市为现代生产者提供的知识、技术、信息密集型服务,如金融服务、商务服务、政务服务、信息技术、网络通信、物流服务等所具有的高度的空间集聚特性,通过对就业人口的优化来充分调整城市功能。20世纪80年代之后,全球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增长共同呈现出加速的趋势。已有学者用回归分析法得到结果:世界上44个国家2006年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使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提高0.377个百分点。^①

当代中国的城市发展和经济发展一样,始终在不断地融入世界的城市体系和经济体系之中,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主动参与国际大循环,到90年代中后期的全面对外开放,直至21世纪加入WTO,国内的大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城市,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大力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在城市的空间拓展、产业布局的优化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等方面,始终以国际先进城市为标杆,不断探索城市发展的“赶超”路径,由此培育出与国际产业体系、城市

^{*} 李程骅,南京市社会科学院,邮政编码:210018,电子邮箱:doctor211@126.com。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服务业发展推动我国城市转型研究”(编号11BGL103)的成果之一。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发展体系对接的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三大城市群,一批城市成为开放度高的国际性城市。它们代表着国家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参与世界的经济竞争,实际上也是在率先启动探索中国城市的转型发展之路。按照国际城市的发展规律,这些城市在服务业的比重达到或接近 50% 之后,已经进入了追求质量的内涵深化阶段,理应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促使产业结构变轻、变高、变优,让城市的空间价值更高、“精明”增长。但是,由于中国城市与发达国家的人均 GDP 差别仍然较大,国内城市的经济总量、三次产业结构的比重,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性城市相比,多数处于发展的中期阶段,特别是国内行政考核体系的重点仍在城市经济总量的增长和排位上,这就决定了我们推进的产业结构调整 and 大力发展服务业城市转型行动,难于达到预期的目标。从国际经验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产业结构就越合理,服务业的比重就越高,城市的产业空间布局就越优化,但我国的很多大中城市,包括长三角地区原来以工业制造为主的,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一直在 40% 上下徘徊,明显低于国际城市同期发展的指标,这虽然表明我国整体的新型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未来的经济增长空间仍然较大,但从城市发展的水平和发展质量的内在要求来看,我国的城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度地发展服务业,促进城市的产业转型和功能升级,提高单位空间的“经济容积率”,^②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经济增速,主要是靠工业成长来推进的,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尽管增长速度也加快,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不断提高,但总的来看,服务业发展始终未成为国民经济主体。由于我国的城市化,户籍制度形成的城乡二元机构明显,地区之间的行政阻隔大,人口迁移难度大,消费内需无法充分释放,加上大多数城市规模过小,使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发展无法形成良好的互动。有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在 1992~2008 年的 16 年内,城市化率增加了 18.24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 1.14 个百分点,但这期间的我国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仅提高了 5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只有 0.32 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城市与服务业发展之间并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③从 2003 年之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但服务业的发展却慢了下来,这更不利于二者之间的互动。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新的变化,无疑和这一阶段我国各城市以投资拉动和大工业新项目,大

规模扩展城市行政区域范围直接相关(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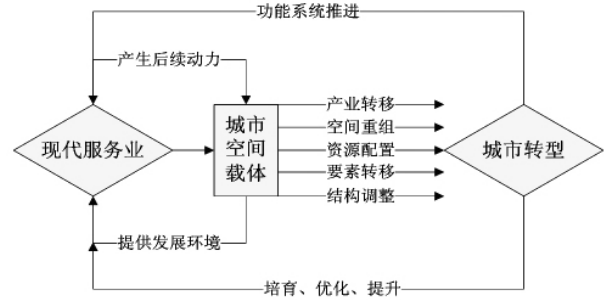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城市化率与第三产业占比的关系 (1978~2009 年)

表 1 2005 年、2009 年国内主要城市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一览^④

	2005 年	2009 年
北京	69.1	75.8
上海	50.5	59.4
天津	41.5	45.3
重庆	43.9	37.9
沈阳	50.4	45.3
大连	40.5	43.9
长春	42.3	41.5
哈尔滨	48.3	49.5
南京	46.3	51.3
杭州	36.5	48.5
宁波	39.77	42.3
厦门	42.4	50.3
济南	46.9	51.0
青岛	41.6	45.4
武汉	49.6	49.8
广州	57.8	60.9
深圳	47.4	53.2
成都	48.8	49.6
西安	52.5	53.7

尽管我国在“十一五”期间服务业的整体发展速度不算快,但国内主要大城市的服务业却已经进入了加速期,尤其是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新趋势促进大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以“腾笼换鸟”来加快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建设,着力发展金融业、房地产业、物流业、会展业、中介服务业以及服务外包业务等,城市的服务业结构发生了大变化,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大幅提升。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2009 年的服务业增加值已经占到地区生产总值的 60% 左右,北京更是高达 75.8%,它们实际上率先将中国城市引入服务经济的发展阶段,与国际城市的产业体系实现了对接。从表 1 可以看出,按照 2005~2009 年的服务业发展增速,深圳、南京、杭州、武汉、成都、西

安、厦门、济南等一批国内省会、副省级城市,服务业增速每年只要在1个百分点左右,也将在未来5到10年形成服务经济体系。

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由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带来的可用土地的“倒逼”、用地指标的限制,多数大城市在制订“十二五”规划中,开始自觉地在城乡空间一体化、区域空间一体化进行产业空间的重新分工,把核心的产业空间逐步变成城市的功能区,产业园区则逐步城市社区化,产业布局呈现出区域型集聚特征。到了这一阶段,服务业的发展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就更有条件呈现对应性,一方面,由于产业结构由重变轻,服务业成为政策鼓励发展的主导产业,产业空间与城市空间开始有效融合,另一方面,基于新产业价值链的现代服务业,在超越城市自身空间的大区域、都市圈或城市群的空间内进行要素整合和资源配置,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清洁发展提供了空间基础和要素整合条件,有助于加快形成服务经济体系。

以城市化为内容的产业升级,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把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引导到以城市化为主体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上,而不是消极地毁坏其生产能力。^⑤不过,就我国现阶段的制度环境来看,通过服务业的发展来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加快城市转型发展步伐,并实现转变发展方式的大战略,还存在着明显的瓶颈制约,还有不少障碍去克服。毕竟,我们是以政府为主导来推进城市化的,又是政府主导下的产业升级,城市化主要靠土地城市化和人口户籍的城市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而产业升级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并重”的口号下,需要长期培育、短期很难见效的现代服务业,就会被放到次要的位置。在GDP仍作为行政区域考核、城市经济总量仍作为竞争排名的大环境下,面对房地产业具有持续的财富效应、政府出让土地的收入成为政府主要财源的现实,城市转型发展、建立现代服务经济体系,也很容易成为挂在墙上的“蓝图”。因为对于城市的政府来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大规模的工业项目,对于经济总量的提升是比较容易的,而发展现代服务业尽管对城市发展具有多重效应,属于“内涵式”发展,但毕竟要有一个时间的过程,还充满一定的风险。从这些方面来看,如果不实施强有力的“倒逼机制”,很多城市即使有转型的条件和能力,也可能继续走传统发展的老路。

二、现代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发展的动力机制

城市转型的动力机制来自于产业的持续升级。20世纪80年代后,信息革命、知识经济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新型的现代服务业构建起了全球产业价值链,使城市转型不仅仅是自身的问题,也是全球城市共同发展的新命题。基于此,现代城市的转型,在持续推动产业升级、不断深化与强化城市主要功能的同时,还必须创造城市经济发展的外部效益。一方面,现代城市的发展是靠工业革命的综合推动的;但另一方面,工业化虽然加快了城市规模的扩张,却没有解决城市功能的提升、城市空间价值的提高、城市人生活质量的提优问题。世界城市转型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都已表明,工业化造就的“城市病”,只有靠服务业才能有效解决,城市的转型发展的新动力已经转换为服务业,特别是新兴的现代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是在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下得以快速发展的,是建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基础之上的。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大城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进行了跟踪研究,均表明现代服务业对城市转型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系统的促进作用。^⑥与传统城市相比,现代城市最大的特点是服务从“在地化”变为“在线化”。在当今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城市面对的不仅仅是自身的市场,而是一个遍及全球的市场网络,而单个的城市就成为这个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和管理中心,集中统一管理和控制全球各地的生产活动和环节,越来越具有流动空间的属性。因而,城市能级水平的高低也越来越依赖于是否具有更大的流动性、集聚力以及辐射能力。现代城市的发展是通过其流量如信息、知识、资本和人才等流动,而不是靠它们的存量凝结来实现的。现代城市转型和能级水平的提升,必须转向经济体系的服务化,必须能够提供大量的现代服务活动,特别是生产者服务,努力创造生产性服务业新优势。对于中国的大城市来说,与规模的快速扩张、人口的快速增长相比,产业升级的步伐却相对较慢,通过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构建服务经济体系,不仅能解决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而且可以借助对就业人口结构的优化、产业空间的重组,来解决处于爆发期的诸多“城市病”。因为,与传统工业产品相比,现代服务业的“服务产品”是非竞争的、互利的,“外溢”效应就可能对社会产生广

泛的福利,使整个社会受益。

全球性的产业组织从“生产化”转向“服务化”,也促使现代服务业在全球城市发展的竞争中,特别是在世界城市体系的构建中发挥了引领作用,促进了城市能级的提升。服务型跨国公司的快速成长,加速了大城市产业空间与城市空间的融合与优化。联合国贸发组织发布的数据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后,服务业成为全球产业转移的新兴领域,在全球服务业中增长最快的是国际服务贸易,1980~2000年期间,世界服务贸易额增长了近400%,年均增长率为7.1%。^②服务型的跨国公司利用其在资金、技术、信息、品牌和网络上的巨大优势,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区域中心城市因此逐步显现“总部经济”效应。随着服务业市场壁垒的进一步降低,全球掀起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项目外包则成为跨国公司广泛应用的经营形式,制造业生产企业的组织模式也发生了从大规模生产向大规模客服务化转变的趋势,产业组织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体系的升级,构建了城市的服务经济体系,新的服务经济体系直接带动了产业结构调整、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和对高端劳动力、人才价值的重新评估。

从城市空间价值提升和整体空间优化的角度来看,现代服务业的“空间落点”,促进了大区域性的城市空间要素加速集约化。现代服务业所具备的产业特性,决定了其在城市空间落点的对应性。新兴的现代服务业在以新理念、新业态和新方式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成为城市能级提升的重要动力的同时,更加凸现出它的城市集聚效应,直接发挥了重组城市和区域空间的作用。第一个方面,国际产业分工垂直体系的形成以及全球城市层级差别化现象的凸显,促进了服务业向大型城市集聚,以大城市为核心、以城市群或城市圈为主体的新型城市体系得以形成,而中心城市集聚发展要素的功能和其他城市服务功能的不断加强,使得现代服务业不断向大城市集聚发展,在中心城市形成强大的服务能力和创新能力。而在现代开放性的城市发展体系中,这种服务能力和创新能力必然产生溢出效应,其结果是中心城市辐射、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的发展,而大城市也成为了引领整个区域发展的强大引擎。第二个方面,服务业企业多在城市内部或者是主城区发展和集中,成为了城市布局中的核心单元。现代经济的发展需要的是先进生产要素,如科技资源、高科技人

才资源及资本资源等等,这些先进的生产要素首先流向大城市、中心城市,并通过这些城市集散,企业总部及其研发中心、营销中心聚集在城市中心区,城市中出现CBD、金融区、商贸区等现代服务业产业集聚区和功能区,在加快城市空间的“腾笼换鸟”的同时,就强化了优质空间要素的集聚。

城市作为现代服务业的基地或载体,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现代服务业通过作用,使城市在产业转移、空间集聚、资源配置、要素转移、技术扩散、结构调整方面发生了变化。基于上述的实践验证,现代服务业对城市转型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系统的促进作用:

1. 现代服务业的引领性、产业融合性,促进城市和区域内产业价值链的形成和完善。现代服务业具有很明显的产业融合性,它能与各行各业相互融合、渗透,这种融合性就把技术、科技、文化资源、制造和服务融为一体,有利于城市产业链的延伸,从而大大拓展了城市产业的发展空间,优化了城市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发展,催生城市内在布局优化的牵引力,使城市形成有各种特色城区,城市的产业空间与整体的城市空间形成了融合、和谐的关系,产业对城市空间优化的贡献度明显加大。

2. 现代服务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资源整合效应,大大提高城市经济容积率和整体的服务功能。在现代城市经济发展中,现代服务业企业会在更高层次上寻找降低生产成本的方式,更多的会在“地域集中化经济”形式中寻找规模经济效益,更侧重于服务业产业“地域集中化”而产生的整体规模效应和整体产业链的形成,这就是外部的规模经济效应。现代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体系中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能力较高,能够带动城市中多种产业的发展,从而能促进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整体经济的繁荣。

3. 现代服务业的外部性在城市转型中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现代服务业的“服务产品”是非竞争的、互利的,“外溢”效应就可能对社会产生广泛的福利,使整个社会受益。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扩大城市就业,改善城市资源、美化城市环境、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方面,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4. 现代服务业的创新溢出效应推进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创新文化的形成。城市转型必须依靠“创新”机制和能力来推动,即通过对城市产业结构及其

他发展要素进行创新变革,从而实现城市的转型。新增长理论认为,一国或一个城市经济增长情况取决于其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而一个城市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往往是知识中心、技术中心,集聚区的创新活动有利于带动城市整体社区活动的活跃。同时,集聚区内各企业的竞争压力大,迫使他们加快产品的开发、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从而推动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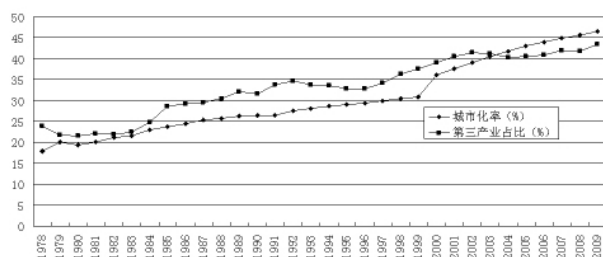


图2 现代服务业与城市转型关系示意图

我国的城市化是在欧美完成两次城市化之后的第三次城市化,理应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城市转型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欣慰的是,我国的新一轮城市化运动,正由“土地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向以产业升级主导、城市空间集约的“精明增长”型城市化转变,城市成为服务业集聚发展的载体,服务业又因城市的集约化而进入规模增长和结构优化期,现代服务业成为城市转型升级的新型动力系统。但在中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之下,服务业的发展及在城市转型中的效用发挥,必须是政府和市场形成的合力。无论是现代服务业的规划和发展,还是城市转型的目标和路径的设计,政府的引导作用和制度性的保障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由于现代服务业的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其理论依据远远不能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我国新一轮的城市转型,如何结合国情和现实,借助现代服务业大发展的系统推力,走出“精明增长”的新路径,让服务业的产业要素与城市的空间要素得到最佳配置,则需要有创新型的思维和大胆的探索与尝试。

三、探索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的“中国路径”

从发达国家城市转型的规律到中国城市转型的现实动向,我们都不难看出,经济全球化下的现代城市转型升级,必须首先进入全球生产网络,参与全球产业分工,通过创新不断攀向价值链的高端,促进经济结构服务化,产业活动服务化,产业组织服务化,

空间要素集约化,从而使城市服务功能不断强化,保持在全球经济体系、城市体系的核心竞争优势。当前,中国的城市虽然在转型发展上刚起步,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重要地位更加突出,因此中国城市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构建服务经济主导的现代经济体系,就会比较容易地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提升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地位,成为全球城市体系中的节点城市,从而在战略层面让城市转型和产业升级形成良性互动。

当然,尽管发达国家的现代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方面有经验值得借鉴,但由于我国的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较快,加上当前处在一个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阶段,所设计的城市转型、产业升级的战略路径必然具有“中国特色”。根据我国“十二五”规划建议和纲要的内容,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推动特大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拓展新领域,培育新热点,发展新业态,推进服务业规模化、品牌化、网络化经营,不断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发展提速、比重提高、水平提升将是“十二”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特征。按照服务业优先发展的原则和GDP增长的预期目标,我国“十二五”期间的服务业增加值将上升大约4个百分点,占GDP比重达到47%。服务业增长速度快于GDP增速1~2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比重上升5个百分点以上。^⑧要实现预期的阶段性目标,无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入加速期,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区域一体化、精明增长成为新的追求。因此,面向“十二五”及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国内城市如何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城市功能的提升、城市空间的重组以及城市的转型战略进行有机结合,让先进生产要素在城市和区域空间内发挥“乘数效应”,促进服务业发展与城市转型升级的互动,成为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应对的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

城市转型不仅仅是产业的升级转型,也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制度整体转型的过程,当前国内城市的服务业发展存在观念误区和路径依赖问题:以抓制造业的粗放式手段来抓现代服务业,创新驱动的动力机制有待加强;现代服务业的主体培育和企业制度建设滞后;政府为服务业发展提供的公共服务缺位。现代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效应、要素整合功

能在城市功能的提升、城市空间的布局规划上尚未得到体现,服务经济的带动性不够。我国的城市,即使是东部沿海地区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功能与国际上的“服务型城市”的差距仍然很大。国内城市转型能否成功,直接取决于从制造业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迈进的关键节点的把握,取决于整体的转型环境和创新的动力机制。国内城市转型发展,要想突破“路径依赖”,必须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共同推进,来解决城市的经济结构调整与空间扩展的矛盾,提高经济容积率与培育新产业价值链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不适应的矛盾等等,而这一切,除了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以现代服务业的多重功能来推进城市转型升级,别无选择。

因此,基于战略机遇期、强化“内涵式”发展以及彻底转变发展方式的综合考量,国内城市当应通过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来推动城市的创新和转型发展,并探索出一条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的“中国路径”:以制度创新为突破,有效运用政府和市场的合力,通过现代服务业企业的主体培育和集聚区的载体建设来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构建“服务型”的主导产业体系,进而优化城市产业空间,提升城市创新功能和服务功能,扩展服务经济的外部效应,促进城市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协同发展,从而以经济的转型带动整体的功能转型,促进城市的不断升级和包容性发展。

实践现代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的“中国路径”,既要遵循国际城市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更需根据我国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的现实基础,按照转变发展方式这条主线,设计好“十二五”期间的重点任务,并体现在战略性的行动上:

首先,把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与地方的制度创新有机结合,形成城市、区域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协同力量,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和集约化主导的新型城市化。我国的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发展阶段不同、沿海城市与内地城市不同,各自的城市化水平、制造业发达程度、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特色都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城市产业升级、转变发展方式的途径不可能完全相同,也不可能选择一种转型模式。但总的来看,“十二五”期间,服务业的增长率、增加值必须超过同期 GDP 增速,特大城市、沿海大城市,包括中西部的大区域城市,要率先实现转型,形成服务经济的主导结构,从而在转变发展方式上起到引领作用、示范作用。我国在“十一五”期间,密集出台了

多项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对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总体定位是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成为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中心。2010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开展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通知》,全国第一批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 37 个城市(地区)获批,试点期限 5 年。试点城市(地区)将着力解决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破除阻碍服务业发展的机制体制约束和政策障碍,重在突出和示范效应。这些战略规划、制度政策和行动计划,无疑在“十二五”期间将发挥导向型的作用,但国家鼓励地方在现代服务业发展、提升城市功能的创新举措,同时应把具有“样本”意义的地方创新,在全国范围进行推广,从而形成创新驱动城市发展、产业升级的“集体行动”,促进城市产业高端化、空间集约化、功能服务化。

其次,把握我国新一轮现代化交通网络、城市基础建设的大机遇,在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重组城市产业空间,扩大现代服务业集聚效应,提升城市的经济容积率。根据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城乡一体化战略,新一轮城市化的重点应该是区域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让中心城市与城市群、都市圈形成互动、融合发展之势,从而实现空间资源效益的最大化。伴随着区域一体化、同城化时代的到来,国内城市迎来了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功能升级的新机遇。一方面,快速的交通网络,使知识、资本、技术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要素集聚的程度更高,中心城市、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加强。另一方面,高铁站、空港带动的新产业区,又成为现代服务业的新载体。国内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热,将直接重组城市的产业空间、生活空间,在一个城市的范围内造就新的中心,这将有利于城市重新规划、布局现代服务业的“空间落点”,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提升经济容积率。因此,在未来的城市转型进程中,高铁是大区域范围整合高端资源要素的“通道”,地铁是促进城市机体内部循环的“血管”。对外“通道”与内在“血管”的有机结合,就可以高速、高效率整合发展的资源要素,培育和壮大高端产业,持续强化城市的核心竞争优势,优化服务业的发展环境。

再者,大力培育服务业领军型企业,鼓励制造企业的服务化和“走出去”,带动城市服务业水平的整体提升。政府对服务业企业政策激励的重点不应仅仅停留在企业经济意义上的规模产出能力,应该在“品牌、专利、技术标准、技术先进性”等自主创新方

面的产出能力上。无论新增项目投资、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还是科技项目投入、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还是对企业的各项奖励等方面的政策,都要突出提升“创新能力”的核心价值导向。与此同时,大力培育和引入生产者服务业,把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与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提升结合起来。“制造业是服务业的生身父母”,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更是制造业升级、分化的结果。国内很多城市在加工制造业和重化工业方面有很强的国际比较优势,而较强的制造业优势是我国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基础,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繁荣本身就会扩大现代服务业的需求空间。随着我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已经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国内城市应该通过产业引导来促进大型制造企业集团向服务型企业转型,并通过建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集研发、设计、采购、物流和营销等多种生产性服务功能于一体,在做大服务业规模、提升服务业水平的同时,不断强化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产业升级与城市转型,是我国“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能否形成服务业主导的“三二一”经济体系,是国内城市阶段性转型行动是否见效的重要标志。探索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的“中国路径”,既要把握外在的和内生的大机遇,更要通过对应的政策落实,将战略谋划转化为具体的措施、行动。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服务业发展不可能像工业那样很快见到效果,城市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更是难以预料,这就使政府主导下的“服务业提速”和城市转型发展之路,在现行的政绩考核体系之下,充满了挑战,甚至会受到阻滞。只有改变当前的政绩考核方式,用科学的指标体系形成“倒逼机制”,才能转变发展的理念,让城市之间告别GDP的规模、增速之争。比如用节能减排的硬指标来倒逼城市产业升级、发展能耗较低、附加值高的现代服务业,用单位土地的“经济容积率”来倒逼园区的“精明增长”,用税收调节的杠杆作用促进制造企业向服务企业转型,用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等更细化的考核指标来倒逼城市产业园区、科技园区产业高端化等等,从而为转变发展方式、城市的转型行动,提供系统的保障、可持续的动力机制,从而探索出一条更加优化的服务业引领下

的城市转型的“中国路径”。

注:

- ①③李勇坚:《城市与服务业互动发展:趋势与对策》,《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 NO. 8》,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
- ②裴长洪 李程骅:《论我国城市经济转型与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南京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 期。
- ④根据各省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整理。
- ⑤刘志彪:《推动基于城市化的产业转型升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 7 月 20 日。
- ⑥郑琼洁 李程骅:《现代服务业与城市转型关系的审视与思考》,《城市问题》,2011 年第 12 期。
- ⑦厉无畏 王慧敏:《世界产业服务化与发展上海现代服务业的战略思考》,《世界经济研究》,2005 年第 2 期。
- ⑧夏杰长等:《中国“十二五”时期服务业的发展目标、思路和政策建议》,《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NO. 9)》,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参考文献:

- Castells, M. (2000),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Edition, Blackwell Publishers.
- Fuchs, V. (1968), *The Service Econom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Gronroos, C. (2000), *Service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John Wiley & Sons.
- Bombay, H. N. (1995), "In a global economy —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the role of cities", *Cities* (3): 175—184.
- Grubel & Walker (1989), "Service industry growth: Cause and effects", Fraser Institute.
- Andersson, M. (2004), "Co-location of manufacturing & producer services", *Working Paper Series in Economics and Institutions of Innovation*.
- Papayrakis & Gerlagh (2004), "The resource curse hypothesis and its transmission channel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81—193.
- Florida, R. (2002),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Basic books.
- 周振华, 2009:《城市转型与服务业经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李江帆, 2004:《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江小涓 李辉, 2004:《服务业与中国经济:相关性和加快增长的潜力》,《经济研究》第 1 期。
- 程大中, 2004:《中国服务业增长的特点、原因及影响——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及其经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 2 期。

(责任编辑:白丽健)